



走出“县”场，返回“县”场

——樊健军的县城叙事与南方风物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县城对于常年生活于此的作者来说是贫瘠的，是一种限制。但是樊健军有他的办法，那就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弱点，他把它发展为优点。在他笔下，主要体现在对‘邮票大’的地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挖掘。”“总结樊健军，就是‘用早已离开县城的文学理念，一次次返回县城’。”阿乙曾经如此评价我省作家樊健军。

近日，樊健军携新作《极昼故事集》来到南昌青苑书店，与多位文学名家一道，共话县城叙事与南方风物。本报对其进行了专访，看他是如何构建独树一帜的南方县城文学世界的。

从修水出发，扎根县城

“于无声处听惊雷，用轻巧的笔法揭示暗藏在生活之下的汹涌暗流，将小城生活变得瑰丽多姿，让我们在愉悦中接纳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社会侧面。”樊健军一直生活在修水，水门村和县城成为他创作的源头。熟悉的生活让他更容易找到进入文学的路径，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尝试着朝陌生的地方走，去触摸不曾抵达的边界。这种冒险给他带来了快乐，也拓展了他的创作空间，让他获得了创作上的自由。

阿乙评价樊健军的写作有“福克纳式的耐心”，在挖掘小地方的历史和人性时，樊健军是如何做到“慢工出细活”的？

“县城会给人提供一些独一无二的文学滋养。”樊健军对去年中国作协开展的抵达文学“县”场活动记忆深刻，这个活动第一站就放在修水。“修水形成了独特的县城写作现象，这里有庞大的作者群，他们的创作需要有人看见，需要有光照亮。”

“我熟悉的是修水这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这里有我的亲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邻居。我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对这方土地的感情。我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可以从身边找到原型，虽然我将他们乔装打扮过，但熟悉他们的人肯定能一眼认出来。”

“县城是熟人社会，县城生活是透明的，缓慢的，这让我很容易获取创作素材。但这些素材往往烟火气很重，世俗气味很浓，泥沙俱下，需要提炼提纯，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纯净水’。”

樊健军的笔下多是普通的县城人物，

哪怕陷入生活的困境，也始终有种不甘平庸的韧性。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他的笔端带着对家乡人的共情和理解。“他们经历的生活，正是在我经历的生活。我与他们是同频的。他们每个人都是角斗士，都在同生活角斗。他们背负生活之重，隐忍承受，在庸常中日复一日，执拗而又恒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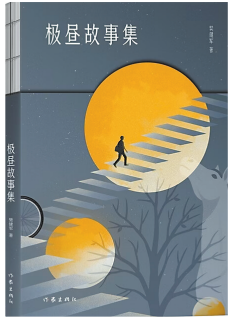
《极昼故事集》里的“非典型县城叙事”

樊健军的新作集叫《极昼故事集》，收录14篇短篇小说，源自其少年时期真实记忆。作品打破传统时间叙事，以空间结构构建叙事，植入地图、油菜花等意象，被评价为“被忽略的精神自传”。《极昼故事集》这个名字似乎对应了县城那种漫长又明亮的庸常生活，还有普通人在其中追光的状态。樊健军认为，活着，就是一种极昼。极昼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这种自然现象对人的命运似乎是一种隐喻，隐含着不确定和不可知，容易让身陷窘境的人感到灰暗和绝望，又让人始终对未来充满好奇，抱有信心。

在这种“非典型县城叙事”中，樊健军刻意弱化了地域标识，淡化了时代刻度。他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更多是以回到内心为叙事路径。“我是透过针孔在窥探一个大世界。”樊健军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我小说中的世界同外部世界始终是贯通的，



樊健军 著
《极昼故事集》
作家出版社



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同我生活在同一个县城，也可以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从来没打算让我的人物困囿于某个县城，困囿于某个村庄。他们的世界同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不可分割。”

在这部小说集中，他的书写很在意“物”的流动。《父亲的地图》中，地图既是剿匪父亲职业生涯的版图，同时也是他不断拓宽自己创作边界的见证。剿匪父亲大半辈子被困囿于村庄，但他始终渴望外部世界，后来他的出走也就在情理之中。《榫卯记》中，开山师傅背着的小木笼，带着某种隐喻，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读者好像也能感觉自己也背着一个笼子，区别只是有形和无形而已。

“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将文学植根于一小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这给我的创作带来了便利，但同时我也在被动接受这一桎梏。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在同这种桎梏做斗争，尽可能让自己从中脱出来，让文本陌生化和富有现代性。《极昼故事集》就是这样尝试的结果。”樊健军说。

对县城写作的思考与探索

《极昼故事集》的主人公多是少年，少年人处在爱幻想的年纪，对现实的不确定和未知无法把握。这些记忆中的故事，有着樊健军喜欢的时间的纵深、空间的广阔和无解的神秘。“小时候时常可见的一个人物，经过几十年的沧海桑田，早已变化成了另一个人物。生活已经对他塑形，让他无法忤逆时间的规律，无法逆时而行。当年发生的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人物的命运辗

转留下了清晰的轨迹。”

“生活或者说现实，已经剔除了不必要的枝枝蔓蔓，延伸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旁逸斜出。我们恰恰需要这种生活赐予的虬枝。”有一段时间，樊健军喜欢狂欢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会给他带来酣畅淋漓的感觉。他不喜欢过于写实的风格，县城生活给他提供的素材过于接地气，世俗化的东西多，落实到创作中就要保持离地三尺的高度。因此，在写作中他也喜欢变形和异化，喜欢隐喻和象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直指人物的精神空间，同时也增添阅读的趣味。“在县城创作，一双眼睛要分成两只，一只当路灯观照人间，一只上灯塔仰望星空。”这样的写作让他更能击穿县城生活的表象，挖掘人性更深的地方。

去年10月，省作协专门就“在县城写作”这个主题在瑞金举办了2025年江西小说创作研讨会，聚焦县城文学创作，探讨小说创作与文学空间的意义，以及作家如何扎根基层、书写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樊健军是怎么看待当下文坛越来越受关注的“县城写作”热？“跳出县城写县城”，它和传统的乡土文学、城市写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樊健军认为，当下，“在县城写作”被视为一种创作姿态和现实写照，要求作家既扎根具体地域土壤，又能升华到人类共同经验的高度。县城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是处于乡土与都市之间，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平台。县城作者群体庞大，为众多，很多名家都是从县城走出去的，县城慢节奏的生活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时间保障。但是，在县城写作，受到的桎梏还是比较多，特别是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容易造成素材的枯竭。“作家要像个找矿的人，在旷野上走走停停，发现尚未开采的富矿。”另外，“要解除这种困境，首先还是要多阅读经典，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同时也要不断深入生活，发现生活背后的人间烟火和故事张力”。

在“县”场，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写，量变才会引起质变。”樊健军认为，作家不要怕犯错，要不断去尝试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文体，不断去训练自己，尽可能拓宽自己的创作边界，“把那些看起来貌似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给自己设置难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拿出高质量的文本”。



六重棱镜下的灵魂显影

□ 罗旭初

北乔的军旅小说集《瞄准》犹如一组精密的文学棱镜，六篇作品折射出和平年代军人灵魂的不同光谱。在《缺口》《虚光》《瞄准》《七秒》《军歌》不仅是用来唱的》《天空有云彩》这些充满张力与诗意的标题下，作者完成了对军人内心世界的深度勘探与多维显影。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军人的作品集，更是一部关于尊严、选择、坚守与奉献的心灵史。

《缺口》以训练场上的意外为切口，揭示纪律与人性碰撞时的微妙张力；《虚光》借军事演习的迷雾，叩问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军歌》不仅是用来唱的》则通过歌声的传承，串联起代际间的精神对话。这种“散点透视”的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军旅文学单一的价值输出模式，让军人的形象从符号化的英雄模板中解放，成为具有复杂情感与思想深度的立体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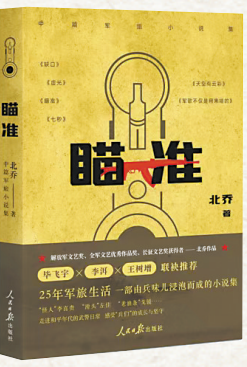
北乔的叙事更体现在对“日常军事生活”的诗性开掘上。在《七秒》中，“用心瞄准，无意击发。瞄准是为了射击，可射击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击中目标。这个目标是胸环靶，又不是那纸糊的胸环靶”。一个战术动作的七秒时长被解构成意识流的蒙太奇，子弹的轨迹与战士的呼吸形成共振；《天空有云彩》则将军事演习的云图变化与士兵的心理波动巧妙勾连。这种将军事术语转化为文学意象的手法，使硬核的军旅题材焕发出柔软的艺术光泽。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微观叙事”的美学追求。《七秒》中某个瞬间的心理波动，《虚光》中难以捕捉的精神困顿，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微小时间”与“边缘状态”，恰恰成为作者解剖人性深度的重要切口。这种写作姿态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珍贵的真实感。

在人物塑造上，全书展现了一位作家对“复杂性”的尊重。作者笔下的军人不再是符号化的英雄，而是充满矛盾与挣扎的鲜活个体。作者拒绝将英雄神化，而是通过生活化的细节让人物落地生根。《缺口》中李喜贵向不会抽烟的兵灌输他的“李氏理论”，《军歌》里孙鹏与战友吹牛之语，这些具象的个性特征成为精神品格的物化载体。

作者的语言兼具诗性的灵动与评论家的锐利。作为诗人，他善于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波动，并将其转化为富有质感的文学意象；作为评论家，他又能赋予这些意象以思想的光泽。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使这部小说集既保持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又具备了思想文本的深度力量。文字不仅是表达的“筏”，更是思想的“火”，在照亮人物内心的同时，亦点燃了读者的思考。

小说集最终瞄准的，不仅是军人的职业身份，更是人性在特殊境遇下的无限可能。作者通过这六篇作品，构建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位军人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痛、有理想也有困惑的复杂个体。这部中篇小说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军人群体的新视角，更在于它以其精湛的文学技艺，丰富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为如何书写特殊群体的普遍人性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品读完这部中篇小说集，我感觉其价值不仅在于它为当代军旅文学另辟了新的美学路径，更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着时代精神的建构。作者用六个中篇构筑的实则是一座关于军人精神的纪念碑。在这座丰碑前，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石料”，而是有温度的血肉；听到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韵律的心跳。



《瞄准》
北乔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书的古往今来

□ 谈宜斌

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远古时期，没有文字，我们的祖先用结绳和刻木记事。原始社会末期产生文字以后，人们便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随着青铜器时代的出现，人们又把文字刻在铜器和石鼓上。

书的雏形形成于商代中期。这种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竹简”和“木牍”，它是在竹子或木头劈成的薄片上写字，再用绳子、皮条串在一起而成册。竹简和木牍在我国盛行了1600多年。竹简和木牍使用起来可真不容易。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本，就达120多斤。西汉时，东方朔写一篇文章献给汉武帝，共用竹简4000多根，由两个身强力壮的武士抬到宫廷去还感到很吃力。《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是说孔子晚年读《周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竹简的绳索翻断了多次；后人引申出“韦编三绝”这句成语，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专业用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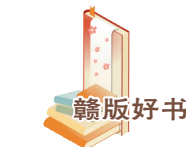
春秋末期，随着我国蚕业的发展，人们便开始用丝织品来书写，谓之“帛书”。这种书写既流利，吸墨性又好，常见的字体有楷书、隶书和行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还可以绘画插图。书的尺寸有长有短，有宽有窄，中间或两头用木棒做轴，可以卷起来，一部书就是一卷或几卷绸子写成的。后来“卷”也就成了书的量词或书籍，“读书破万卷”“手不释卷”等的“卷”字，即由此而来。

到了西汉，我国人民发明了既轻便又好书写的纸，使之逐步代替了笨重的竹简、木牍和昂贵的帛书。1957年，在陕西西安东郊的灞桥发掘了一批纸，出土时为淡黄色，最大的纸张10×10厘米，最小的3×4厘米。据考证，这种“灞桥纸”，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的遗物，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纸。东汉蔡伦，总结了前人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的方法，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物，把它们捣烂成浆，然后把浆状物薄薄地摊到细网上，滤去水分，干燥后便成了纸张。在我国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用羊皮和树叶做书写材料，直到12世纪末，才开始本土化造纸。

隋唐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使书籍摆脱了人工抄写的状况，大大提高了书籍生产的效率。它是选用纹理细腻坚硬的木料做木板，将需要印刷的内容写在一块薄纸上，反贴于木板上，再根据笔画在木板上逐字逐句地雕刻出来。印刷的时候，把雕版凸起来的文字刷上墨，然后将纸铺在上面，轻轻地压一下，字迹就印到纸上，继而装订成册。但是，雕刻一部书要费好长时间，其雕版也只能用于印刷这部书，不用就废弃了，实在可惜。

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可重复使用字模，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一些弊端，大幅度地提升了书籍的印刷质量和速度。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或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说简单一点，就是将胶泥刻成一个反体单字，用火烧使之坚固，排版时放在铁制的版框内固定起来，随时可以印刷。1314年前后，元代王祿在泥活字印刷术的启发下，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并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活字印刷术的书《造活字印书法》，这就又把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19世纪以来，伴随造纸设施和印刷机的发明，书籍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幅提升，书与人们须臾不可离。激光照排技术推广以后，传统的铅字排版印刷基本绝迹。随之而来的图书，大多是铅线装订，不仅有精装本、平装本、彩图本，而且有大本、缩印本、显微缩印胶卷本等。现代图书十分注重内容和装帧，一般都要经过三审三校，配有精美的图片，有的还印有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可观赏动态视频，甚至还可以通过扫码，将整本书下载下来，供随时随地阅读。尤其是电子书的出现，在图书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海量的典藏，无限更新下载，乃至还有听读功能，简直就是浓缩了的图书馆。



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并置”下的诗意空间

□ 卢辉

如何把握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的互为交织？如何把握工业发展轨迹与时代情结的交融共生？这是写好新工业诗的关键所在。身处赣湘区域的漆宇勤，历经数年创作而成的新工业诗集《慧眼》，正是带着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交织而成的时代情结进入了读者的视线。

《慧眼》以其“在场者”的视角，见证了新工业诗必须用身体去“工业现场”换取第一手诗意。作者作为项目推进者，从2020年至2024年扎根赣湘合作产业园，这让他能从车间、谈判桌和工人指尖捕捉真实细节。比如他的《锣板成型》，细腻地描述出锣刀的切入“如划开连片的森林”、切口“有恍惚的触感”、锣板机管道“如深渊吞咽粉尘”、运行“只管铣切不管收拾”等在场感。更重要的是，他笔下始终有人：既有工人的坚守，也有企业家的担当，体现出人文温度。正因为有这样的“在场意识”，《慧眼》能够紧扣赣湘合作的国家战略，将宏大时代落点在萍乡这片热土上，实现了地方性叙事与时代命题的契合。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慧眼》一旦写到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相互映照之时，其中的诗作总会带着特别的生命气息与时代烙印。作者早期是乡土诗人，这让他面对坚硬工业时，天然带着土地的体温，于是冰冷的机器有了“柔软的角度”。诗歌的核心动力之一就是张力：从握锄头到操控机器，从土地生长庄稼到产出工业品——这种身份、场景、节奏、用途的根本性转变，乃至断裂，制造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工业流程的非人格化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矛盾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空间。同样，农耕文明有土地、种子、节气、镰刀，工业文明有流水线、齿轮、代码、钢花，两类意象的嫁接或碰撞，极易产生蝶变。当然，新工业诗并非止于新鲜的意象组合。恰恰相反，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的真正交汇不是平滑过渡，而是伴随着断裂、不适与牺牲。工业扩张中生态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这些真实的疼痛感正是《慧眼》极力呈现的时代情结。这样的农耕与工业的交汇，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机器颂歌，而是两者之间撕扯、交融、重生的复杂过程。

新工业诗的“新”，既不在单纯的“时代”，也不在单纯的“工业”，而在于一种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人的新感性。是的，“时代”与“工业”是双轨并行的整体。在作者看来，新的时代必然包含新的工业形态，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而新的工业形态也定义了新的时代特征，比如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新工业诗的新，对象是“工业”，但背景是“时代”。没有新工业革命的技术现实，所谓的新工业诗就会失去根基；而没有对“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它就会沦为技术说明书。比如《敏感词》很有特色：“写下褶皱，写下掌纹，写下折痕/写下苍迹，写下全部的敏感词/一个年轻人的人便攸动了世间的沧桑//记住AI，记住算法，记住逻辑/记住语料库，记住人的全部想法和说法/一个人工智能使集合了人间的情绪。”在这组关系里，“工业的变革”是第一性的驱动力。没有无人工厂、AI算法、量子计算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就不会有全新的审美对象和体验。

“人的创新”，即诗人的感知、情感和语言创造，才能将冰冷的工业变革，转化为可感、可思、可叹的诗意存在。所以说，新工业诗的“新”，本质是工业现实引发的人的感知结构、情感结构和思维结构的更新。同时，新工业诗有其时间节点、动能守恒的特质，并非单向度的“新”。它的特质高度依赖于时间性，但这种时间性是复合的、充满张力的。《安装引线》里，哪怕是带着农耕味的枪炮生产，一旦进入新时代“也有引线串联如迷宫”，诗人捕捉到花炮消费市场的“当代性”，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速度感（如今明知每一根引线都指向终点）、失重感（所有古井逃避不了一根汲水的绳索）、断裂感（引线的急性子慢性子）。

与此同时，诗人还要处理“深度时间”。因为，技术越新，我们越需要追问其背后的人类代价、历史根源和未来指向。比如，写AI时，诗人反思它与人类古老灵魂的关系；写芯片时，可以联想到它如何嵌入悠久的文明脉络。正是因为作者不断制造时间的烙印，敢于把代表未来的新工业物象（如服务器、基因序列）与代表过去的农耕文明意象（如土地、节气、乡愁）并置，这种时间上的错位与折叠，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味道”——它迫使读者重新审视当下，让新工业场景不再是扁平、单向的叙事，而是成为承载着文明记忆与未来想象的、有纵深的诗意空间。



《慧眼》
漆宇勤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电话：0791-86847270
本版邮箱：jx2024365@163.com